

第一章 汉字文化圈的 汉字系文字^①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之一。在数百万年的历史发展中，人类发展了有声语言，从而使人类社会得到巨大的发展。在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体系中，语言无疑是表达概念和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手段。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是辅助性的交际工具，它是为了弥补语言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的缺陷而产生的。它从属于语言，是语言的一种补充形式。和语言相比，文字的历史要短得多，人类最早创造的文字，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埃及的圣书字等，也只有六千多年的历史。但正是有了文字以后，人类历史才进入了有史时期，人类也从此进入了文明时代。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文字总是和特定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密切相关，承载着该种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文字本身又是该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文化整体的其他部分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在民族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文字又成为该民族文化的凝聚体和重要标志之一。一句话，文字不仅是一种辅助性的交际工具，它还有着鲜明的文化属性，是各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

本书所说的“汉字文化圈文字”，也特指汉字系文字。

下文中所说的“语言”，如无特殊说明，都指有声语言。

至少有着四千年悠久历史的汉字，它的形成、发展以及在我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传播和深远影响，都是和汉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传播密切联系的。在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各民族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汉字系文字。这些文字的形成、发展及其文化属性，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和发展

作为世界上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之一，汉字的形成时间目前仍难以确定。汉字形成于史前时期，人们对汉字起源的认识只能依靠考古材料。由于年代久远，早期的汉字文献绝大多数都已失传；而我国的地下文化层大多数要么在历史上已遭破坏，要么未经发掘，因此，单靠目前的考古材料，人们只能对汉字的起源进行初步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自甲骨文发现以来，人们一度认为河南殷墟出土的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但事实上，从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甲骨文材料看，其字数已相当多，能记录整句、整段的文辞，已经是一种经过了长时间发展的较为完善、成熟的书写符号体系，汉字的起源应该更早。

在仰韶文化的多数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陶器上发现了许多符号，这些符号目前尚未解读，但它们和汉字的起源可能有某种联系。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据统计共有刻画符号 113 个，27 个类型，这些刻画符号大多笔画简单，一般为直线和交叉线，和古文字中某些笔画简单的字形相似，而和一般的装饰性花纹有明显的区别。郭沫若对这些符号进行了

汉字究竟是什么时代产生的，目前学术界尚有多种意见。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 年版。

研究，认为这些符号就是汉字的起源，并据此认为汉字已经有六千多年的历史。这一看法并不一定正确，但这些刻画符号与汉字的起源有密切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

1974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四个符号，其中一个符号和山东诸城前寨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残缺符号极为相似。加上1979年山东诸城发现的陶尊符号，共计有17个符号。这些符号与商代的有关文字十分相似。唐兰将这些符号与殷墟甲骨文、商周金文进行比较，认为这些陶符“既不是符号，更不是图画与纹饰，而是很进步的文字，是商周时代文字的远祖”。李学勤总结了这些符号的特征，认为它们和装饰性的花纹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其主要的特征有：结构上和后世的甲骨文、金文接近；和金文一样，只见于特定的器种和位置；象形而有相当程度的抽象化；不能分解为若干图案单元。由此可见，当时汉字已经初步形成了。陵阳河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约五千年。

1991年到1992年，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中出土一件盆底陶片，上有刻画字符，右起5行13字，为连笔书写，与后代的行草书极其相似，初步判定为烧制之后刻写。陶器的年代属龙山文化晚期，距今约4100—42000年。经过研究，虽然还不能完全确定文字的系统，但这些字符已经是文字或原始文字则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

参见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载《考古》1972年3期；郭沫若主编：

《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5页

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年代》、《再谈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载《大汶口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78年版。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93年第4期。

王恩田等：《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载《考古》1993年第4期。

综上所述，汉字至少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又是这些古老文字中惟一沿用至今，现在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字体系。

汉字产生以后，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性质、字数、构成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从文字的系统看，考古材料已经证明，汉字起源时期，中原地区部族众多，有着多样的原始文化，其文字系统也有多元性。随着部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不同文字系统之间逐渐走向统一。一般认为，经过尧、舜、禹的部落联盟时期，到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形成之时，中原地区统一的文字也大体形成了。而从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看，汉字的发展变化也是巨大的。众所周知，汉字发源于图画。《系辞》下篇说得很清楚：“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虽然只就八卦而言，但许慎等人认为八卦实为文字之祖，汉字最早也是由图画而来。这是对汉字起源的正确认识。早期的图画文字很少发现，但殷商、周代的金文中，表示族名、人名的象形符号都保存了毕肖原物的特征。因图画文字不便于书写，此后图画性不断减弱，符号性增强，到甲骨文中的象形字，都已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事物的轮廓或其有代表性的特征部分。由于客观事物纷繁复杂，大量抽象事物无形可象，于是逐渐以符号的象征意义来造字，这种造字法称为指事，指事字突破了象形字的局限，标志着汉字由象形字向表意字的发展。此后汉字进一步发展了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字组合起来赋予新义的造成新字的会意法，使表意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象形到会意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但表意方法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到春秋、战国时期，由形符和声符组合而成，既能象声写词，又有表意明确、较好区别同音词等长处的形声字极大地发展起来，并成为汉字的主要造字方

法。在《说文解字》中，形声字已占总字数的 80% 以上，现代汉字中，形声字更占到 90% 多。汉字从单纯表意发展到音意结合，这一发展变化意义极为重大，它使汉字最终发展成为既能表达实词，也能表达虚词，可以按照词序完整地书写语言的高度发达的文字体系。其文字形体也由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等古文字发展到包括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多种书写形式的符号系统，这些书写形式各具特色和优点，且都富于审美价值。文字数量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秦代的《仓颉》、《博学》、《爰历》三篇有 3300 字，到《说文解字》时已有 9353 字，清代《康熙字典》有 47000 多字，1990 年出齐的《汉语大字典》则收了 54678 个字，这是一个宏大繁富的书写符号体系。尽管总字数不断增加，但常用字的数量则没有大的变化，一直保持在 2000 字左右。可见，汉字是一个不断发展、同时又具有稳定性的书写符号系统，这也是其永葆青春和生命力的内在原因。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借助汉字和其他民族文字，创造和保存了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凭借着汉字的稳定性、统一性及其广泛的传播，汉民族内部以及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汉字也成为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节 汉字的传播和汉字文化圈

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古称有“华夏”、“夏”、“华”等多种；“汉”、“汉人”之称始于东汉。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其先民的活动最早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初期，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民族之一。汉族先民远古时期主要

活动于黄河中下游流域，著名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为其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汉族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依次发展，封建社会漫长是其社会历史发展的突出特征。秦代时，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曾有过多次大规模的迁移扩展和民族间的融合，使自身得以不断壮大兴旺，成为我国的主体民族。同时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结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共同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随着汉民族的发展壮大及其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汉文化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在我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长期以来汉文化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作为一个东方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文化一直是整个东亚文化的中心。尤其是汉、唐两代，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其文治武功，都是汉民族的骄傲。而秦汉风貌之气象万千，恢宏博大，唐宋文化之绚丽多姿，光耀万代，即令日本、朝鲜等国都仰慕不已，争相仿效，一时有“万国衣冠拜冕旒”之概，国内的各兄弟民族则更以学习汉文化为荣。汉文化有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对各民族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汉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一直是东亚地区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并对东亚各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汉文化的发展和广泛传播，和汉字的发展传播密不可分。伴随着汉文化影响的逐渐扩大，汉字也广泛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的亚洲国家。在南方，汉字的传播早在秦始皇时便已开始。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将蒙恬征服百越地区，置桂林（广西）、南海（广东）和象郡（广西西部及越南中北部），汉字也随之传播到岭南包括广西、广东、越南中北部的广大地区，百越民族较早地接触了汉字。从那时起，壮族和岭南各少数民族，在较长时间内都使用汉文，汉文一直是当地各民族的官方文字。越南也长期使用汉文，到1945年越南独立后采用越

语罗马字作为“国语字”为止，汉字文言一直是越南的正式文字，时间约两千年。越南称汉字为“儒字”，意为“儒家的文字”，开科取士，一如中土。在历史上，壮族、越南都先后创造了汉字系文字来书写自己的语言，但都没有发展成正式通用的文字。

西南地区，汉字的传入可追溯到战国后期。史载公元前 300 年至前 280 年间，楚将庄蹻率其部众人滇，这是汉字传入西南地区的开始。但汉字在西南地区大规模的传播则始于汉代。汉武帝时，大举开发西南夷，设置郡县，派官员、士兵驻守，并设立学校、传播汉学，汉字的影响也日渐扩大。此后西南地区一直以汉文为官方文字。南诏中后期（9 世纪到 10 世纪）白族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白文，用以书写自己的语言，但它也一直没有发展成为全民族通用的文字。

在东方，汉字首先传播到朝鲜半岛，然后经朝鲜传到日本。公元前 108 年，汉武帝在朝鲜设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汉字也随之大规模传到朝鲜半岛。公元 2 世纪至 3 世纪，朝鲜开始进行汉字文言教育。4 世纪，高句丽设太学，在各地建立学校，传播儒学。公元 372 年，汉字佛经传入朝鲜，对汉语、汉字在朝鲜的传播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后近两千年时间内，汉字文言一直是朝鲜的正式文字。朝鲜民间还借用汉字记录朝鲜语，形成了“吏读”。在朝鲜谚文的创制发展过程中，汉字也起到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公元 3 世纪至 4 世纪，汉字经朝鲜传到日本。据日本史书《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270—310 年在位）时期，汉人王仁应日本人阿直歧之邀东渡日本，带去《千字文》、《论语》等书，后来担任日本皇子的师傅。这是有关汉字传播到日本的最早记载。此后一百多年间，从大陆移居日本的人增多，更多的汉文书籍传至日本。到 5 世纪时，九州地方已开始使用汉文。公元 8

世纪，产生了用汉字书写日语的史书。15世纪“汉字假名混合体”成为通用文字以后，汉文才被废止。其间汉文一直是日本的正式文字，时间长达一千二百多年。

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在我国西北到东北的广袤土地上，曾经建立过三个封建制国家，即西夏、辽、金。西夏的主体民族是党项族，他们与中原汉族的交往十分频繁。1038年，其首领元昊正式建国，国号“白上大夏国”，史称“西夏”。西夏立国之前，日常书面交际都使用汉文。到1036年，才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汉字型的西夏文字。辽的主体民族是契丹族，916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1066年改国号为大辽。契丹人也长期使用汉文，直到建国后才创制了两套汉字系文字。女真族则是今天满族的先民。长期以来，女真分布在今东北的广大地区。史载女真原来无文字，在很长时间内，女真主要使用契丹文和汉文。到12世纪建立金朝后，太祖完颜阿骨打诏命创制女真文字，并于天辅三年（1119年）以契丹字、汉字为基础，增减或变化其笔画制成了女真文字。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汉字作为汉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汉文化的承载者，从秦汉以来就一直不间断地传播到周边各国和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活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字不仅仅是一种书写语言的工具，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一种文化的载体和凝聚体，除了能传播特定的信息以外，它还人们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心理产生深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渗透力。而汉字由于其独特的构形模式和文化功能，在这方面的影响就表现得更为鲜明。历史上，汉字先后传播到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并被长期使用，不仅传播了汉文化，而且还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这些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正如美国日本问题专家埃·赖肖尔在《日本人》中说：“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字、词汇、艺术和许多传统的价值观”

都来源于中国 中国是他们的希腊、罗马。” 这里他指出了汉字和日本文化特征的密切关系，是很有见地的。

事实上，汉字在整个东亚地区的重要作用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法国汉学家莱恩·汪德尔麦什（Leon Vandermeersch）曾提出“汉文化圈”的概念，以此和印度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相区别。他指出，其他文化圈均是因宗教原因而形成的，汉文化圈的形成则主要建立在共同的语言文字的基础之上，其中汉字充当了内在的精神动力。 在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汉字在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整合方面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由于汉字的重要作用及其深远影响，使得东亚地区在文化传统上自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单元，和世界其他的文化地理单元并称，也是当今世界格局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力量。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西方文化的竞争将是未来社会中冲突的主要根源。他所说的儒家文化区，实质上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儒家文化也就是以汉字为载体、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这个文化区域及其影响，是千百年来通过汉字的不断传播形成发展起来的。作为汉文化的承载者及重要标志，汉字就像一根金线，将东亚地区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联系起来，串成一串既有内在联系，又各具风姿的珍珠彩链，闪耀着东方古老文明的独特风采。

当然，也应该看到，“汉字文化圈”这一提法有其固有的缺憾。客观上来说，这种提法是在“传播学派”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传播学派企图用文化圈理论解释一切文化现象是不够实际的。但我们批评传播学派，并不是全盘否定文化传播在人类文化

埃·赖肖尔 (Reischauer, E. O) 《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版。
转引自詹绪左、朱良志:《汉子的文化功能》载《天津师大学报》哲社版 1994 年第一期。

史上的作用，历史已经清楚地说明，汉文化传播对东亚各民族文化的深远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文化现象。而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包罗万象的复杂体，我们在探讨“汉字文化圈”时，不能，实际上也不可能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这一地区的所有文化现象。

第三节 汉字文化圈的汉字系文字

如前所述，从秦汉时期开始，汉字已传播到南方各民族地区，稍后又传播到朝鲜、日本。南北朝时，随着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北方各民族也开始学习汉语汉字。在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汉字文言都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正式文字。在长期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各民族逐渐掌握了汉字的结构规律。同时，随着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单凭汉字文言来进行信息交流，已不能满足日益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创制本民族的文字来书写自己的语言，日益成为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这样的条件下，汉字系文字便应运而生了。作为一种借源文字，汉字系文字是在汉字和汉文化的长期影响下，经过长期的孕育、萌芽、衍化、发展而最后形成的，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共同的特点。

一、汉字系文字的发展演变

汉字系文字的发展演变大体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1. 汉字传播阶段。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汉字很早就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国家，并为各民族及国家长期使用。总的来看，汉字的传播使用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大体从秦汉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时间约为一千年左右。汉字的传播及长期使用，是汉字系文字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2. 假借汉字阶段。前面所述的各民族和地区，都有长期使用汉字文言的历史。虽然汉字长期作为各民族的正式文字，但汉字文言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仍有其根本的缺陷，即它与各民族的口头语言严重脱节。文字本来就作为口头语言的书面形式而存在，是语言交际的重要辅助工具，而汉字文言书写的是汉语，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其本质属性无法得到体现，其交际作用无法得到更好的发挥。而各民族社会经济生活又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单凭汉字文言已经无法满足交际的需要。在长期使用汉字的基础上，人们很自然地开始假借汉字来书写自己的民族语言。假借汉字包括四种类型：借词字，即移植（音意全借），主要用以书写民族语中的汉语借词；借音改意，即“音读汉字”；借意改音，即“训读汉字”；借用汉字字形表示民族语言中某一特定的音和义，其音意均和汉语无关，可以不准确地称其为“借形字”。可见，汉字系文字中的假借汉字与汉字“六书”中“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同音假借字性质并不相同。假借汉字是汉字系文字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在使用至今的一些汉字系文字中假借汉字仍是重要的构字手段之一。

3. 改造和变异阶段。由于完全假借汉字很难准确、完善地书写民族语言，同时也为了使自己的书写符号和汉字有所区别，各民族逐渐开始对汉字进行形体上的改造，使所造新字能表达假借汉字无法表达的民族语音意。这一阶段的造字类型极为丰富。如增损汉字笔画、汉字变形、汉字简化、省略汉字的部分构件、选用汉字古体、变体或某一书写体等，都可制成新字来书写本民族语言。如增损汉字笔画造字就是各民族在借用汉字基础上对汉字加以改造的最初尝试，也是各汉字系文字中

本书中“构字”、“造字”意义有区别。构字泛指整个文字系统中各种书写符号的构成，而造字则特指造成与汉字不同的新字。

较为常见的造字方法。这种造字法没有经过对汉字进行结构功能分析的环节，所造新字没有类似汉字的理据性，很难从字形上推知符号音意，这也是早期汉字系文字难于释读的重要原因。对南方许多民族文字而言，对汉字进行改造变异只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其他一些文字，如契丹大字、女真文等，对汉字进行改造变异则是其书写符号构成的主要方法。

4. 仿造阶段。由于对汉字结构及造字法的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一些民族日益觉得对汉字进行改造和变异有很大不足。特别是南方民族汉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都不主张对汉字进行改造和变异。在他们看来，这一造字法的缺点有二：一是不符合汉字造字的“六书”理论，缺乏理据性，难以认读；二是破坏了汉字本身固有的字形结构，不符合汉字的审美特征。因此，借用汉字及其部件，并按汉字的结构特征进行组合造字便成了必然的选择。所造成的新字就是仿造字。南方许多民族（包括越南）的汉字系文字中，都发展了仿造字，而先前的改造、变异造字法则逐渐被摒弃。当然，从汉字系文字的发展历史看，仿造字也有其严重的缺陷，即造字时以汉字为中心，过分依赖汉字原有的音意，不利于民族文字的独立发展。在仿造阶段中，还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字类型即西夏文，它并不是借用原有汉字及部件，而是借用汉字笔画组合成新字，但它的结构特征大体遵循汉字的造字原则，因此本书将其也纳入这一发展阶段进行考察。

5. 创制表音化符号（文字）阶段。有的民族或邻国，由于语言类型与汉语有较大差异，或是受印度及其他表音文字的影响，先后创造了表音字母，既有表音节的字母，也有表音素的字母。其字母形体脱胎于汉字，或取材于汉字的部件及笔画。书写时有的把字母按先后顺序一线排列，有的则把字母按上下左右叠合在一起。有的表音文字已全用字母书写，有的则与汉字混合使用。总的来说，这一发展主要出现在书写黏着语（属阿尔泰语

系)的文字中。这是其发展过程中一次质的飞跃,标志着该种文字从根本上摆脱了汉字体系的束缚,文字类型与语言类型得到统一,从而也获得了内在的生命力。

以上五个阶段的划分,只是汉字系文字历史发展的大致轮廓。事实上,就特定的汉字系文字而言(尤其是南方汉字系文字),各个发展阶段之间并不是界限分明的。如壮文、白文等,历史上确实都经历了上述的阶段性发展,时至今日,这些文字中既有大量的假借字,又有少量增减汉字笔画而成的新字,仿造字也有不少。虽然这些文字没有创造出纯粹的表音字母,但又表现出某种表音化的趋势。即便是日文这样表音化发展比较完备的文字,其文字系统除表音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外,仍保留了大量的假借汉字。这都说明,汉字系文字是经过长期发展、衍变而形成的复合性的书写符号体系。这些汉字系文字不是完全阶段性地发展,而通常是多种造字方法并用的,只是在以何种造字方法为主方面有所不同。另外,由于文字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受语言类型的制约的,加上各种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综合作用,各汉字系文字的发展情况也各有差异,因此,上述的五个发展阶段并不能完全构成一个有时间先后、层次高低的依次发展的序列。例如,有的文字长期停留在改造和变异阶段,如水书;有的表音文字的形成并不经过仿造阶段,如契丹小字;大多数经历表音化阶段的文字书写的都是黏着语类型的语言,书写和汉语类型一样的孤立型语言的文字,一般不再发展为表音性质的文字,等等。可见,这种阶段性发展不是机械的、绝对的,而是和特定的语言类型和社会文化条件相联系的。

二、汉字系文字概说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汉字系文字主要有 16 种。简述如下:

（一 南方汉字系文字

南方汉字系文字据已知材料共九种，即壮文、字喃、白文、侗文、布依文、苗文、瑶文、哈尼文、水书。由于南方民族众多，文字使用情况复杂，随着调查的深入，将来可能还会发现新的汉字系文字。如毛南族可能也有部分地区使用汉字系文字。这些文字除水书较为特殊外，其他几种都有类似的特征，故归为一类。

壮文历史上又称为“方块壮文”“土俗字”“生字”。壮文是壮族长期使用汉语文言以后，假借汉字并仿造新字书写壮语而逐渐形成的。综合相关文献分析，壮文的形成时间应在唐代。到宋代，壮文的使用已很普遍。南宋范成大（1126—1193年）在《桂海虞衡志》中说：“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字，桂林诸邑皆然。”可见方块壮文虽然没有发展为正式文字，但在民间则广泛使用，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明末以后，壮文应用日少，主要用来记录、传抄民间歌谣等。

字喃的性质和壮文类似。长期以来，越南一直以汉字文言作为官方文字。字喃大约形成于唐代末年，到宋朝后期获得很大发展，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文字。和壮文一样，字喃也是以假借汉字为主，另外也仿造了数量较多的新字。字喃曾在短时期内被提升为官方正式文字，但不久即被废止，因此字喃长期以来也只在民间使用，主要用来书写各种民间文学作品。字喃读物现存一千多种，名作有长诗《金云翘传》等。

布依文。布依族旧称“仲家”，分布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带。布依族在族源上和壮族关系密切，同属百越民族。历史上，汉字很早就传入布依族地区。长期以来，布依族以

参见萧克主编：《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侗、水、毛南、仡佬、黎族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汉文为官方正式文字，同时也假借汉字和仿造新字来书写布依语，形成了汉字型布依文，主要在民间流传，用来书写布依族的民间文学作品，历史上未经统一和规范，没有发展成民族通用文字。

侗文。侗族主要聚居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少数分布在湖南和广西。历史上，侗族长期使用汉文，同时也借用汉字，并创造了少量的仿造字来书写自己的语言，形成了汉字型“侗文”。侗文主要用来书写民间文学作品，没有发展成全民族通用的成熟的文字。

白文。汉字在汉代即已传入白族地区，汉文化对白族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长期以来，白族以汉字文言为官方文字，到南诏（738—902年）时，由于社会的需要，又创制了汉字型白文。从保留下来的文献材料看，约在南诏后期，方块白文即已产生，它以假借汉字为主，另外也造了大量的新字。到宋元时期，白文在白族地区广泛流传，得到很大发展。明代以后，由于汉族移民大量进入白族地区，加上明代统治阶级的文化专制，白文应用范围逐渐缩小。但在白族民间，方块白文直至今日仍在流传使用，主要用来书写白族的民间文学作品以及祭文等。

哈尼文。哈尼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族在历史上受汉字的影响，也创造了汉字型哈尼文字。以假借汉字为主，并创造了少量的仿造字。这种文字在哈尼族地区并不通行，记录的也只是哈尼族中自称“豪尼”的一支的语言。主要用来书写祭礼经、创世史诗等。

苗文。苗族主要分布在湖南、贵州、广西、云南各省（区）。历史上苗族和汉民族关系较为密切，但直到清末，苗族才创制了汉字型苗文，而且仅在湖南湘西地区流传，晚近才被发现。汉字型苗文有三种，分别是“板塘苗文”、“古丈苗文”和“老寨苗文”。前二者创制于清末，后者创制于20世纪50年代，使用历

史较短，主要用于记录、创作苗族歌谣、剧本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瑶文。瑶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在广东、湖南、贵州、云南也有分布。在瑶族民间，也流传着一种汉字型瑶文。据说始创于唐代贞观年间。书写符号以假借汉字为主，主要用来记录本民族的歌谣和传说，由于瑶族居住分散，瑶文因人而异，一直没有发展成全民族通用的文字。

水书。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书是水族的一种古老文字，也是南方汉字系文字中较为特殊的类型。从文字结构看，有的字类似古体汉字（包括甲骨文和金文），另外很多水字是汉字的倒写或反写，有的则是假借汉字。另外，水书中还有许多象形字和指事字，这些字大多和汉字无关。因此，一般认为水书是由自造的象形字、指事字和汉字符号共同组成的。从目前搜集的材料看，水书共四百多字，并且多为昔日的鬼师占卜所用，一般群众掌握水书的不多。但在过去很长时间内，由于水族社会鬼神崇拜盛行，因此，水书的应用十分广泛，它在水族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北方民族的表意文字

这一文字类型主要包括三种文字，即西夏文、契丹大字和女真文。

西夏文。公元 1036 年，西夏出于强调本民族文化的需要，创制了西夏文，与汉文并行使用。与其他的汉字系文字相比，西夏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全部六千多个西夏字都用横、竖、撇、捺等汉字基本笔画重新组合而成，而没有借用一个现成的汉字形体。由于西夏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广，西夏文得到迅速普及，在西夏的社会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西夏文在西夏灭亡后仍有使用，到明代才成为死文字，使用时间约五百多年。

契丹大字。契丹人长期使用汉文，到 10 世纪建国初期才创

制了两套契丹文字。第一套创制于公元 920 年，称大字，第二套称小简字，又称“契丹小字”，创制时间稍晚。从历史记载和考古材料看，两套文字在当时是并行使用的。契丹大小字虽然都是受汉字的影响而形成的，但其文字性质并不相同，契丹小字是表音文字，契丹大字则是脱胎于汉字的表意文字，每个或两个字代表一个词，有的直接借用汉字，有的是从汉字增减笔画而来。契丹大字共一千四百多个。释读工作有较大困难，就已经释读的大字来看，都属于单体的表意或表音字符，没有复合的会意字或形声字。辽灭亡后，契丹大字成了死文字。

女真文。在汉字和契丹字基础上创制，公元 1119 年颁行。1138 年又另创一种女真字，1145 年颁行。前者称女真大字，后者称女真小字。目前学术界较为统一的意见是女真小字已失传，现存的女真字一般是大字。从传世的女真文看，它是在契丹大字和汉字的基础上加以增损，构成“意字”或“音字”。因女真语是多音节语，因此一个女真字表 1—4 个音节，每字 1—10 笔，总字数约为九百多个。金朝灭亡以后，中原女真人转用汉字，不再使用女真文，东北女真人则沿用了约二百多年。最后女真文也成了无人认读的死文字。

（三）表音文字（字母）

根据目前的材料，表音文字共有四种。其中包括三种音节文字（字母），一种音素文字（字母）。音节文字有江永女书、日本假名、契丹小字；音素文字是朝鲜谚文。

江永女书。湖南省西南地区的江永县、道县一带在妇女中间流传着一种书写当地土话的文字，称“妇女字”或“女书”。传说该种文字创制于唐宋时期。从笔画看，女书和汉字有较大差

由于当地民族众多，语言情况复杂，女书书写的是何种土话，学术界仍有不同意见。多数意见认为女书书写的是当地汉语的五岭话。